

让精神长河在故事中奔流

贾立政



《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陈晋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奋斗历程中，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一次次历史抉择中的信念坚守，是无数普通人与杰出人物在艰难处境中的行动回答。由陈晋主编的《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以下简称《大河奔流》），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经，以一个个可感、可触、可思的历史故事为纬，在宏观历史与具体人生之间搭建起一座富有温度的叙事桥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读这部作品，不只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面向现实与未来的精神追问。它让历史中的人物、现场、细节和情感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使精神成为可以体察的生命经验。

全书以“烈火淬炼”“壮丽史诗”“革故鼎新”“万象更新”四个篇章，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书呈现出清晰的历史纵深：从北大红楼的思想启蒙、井冈山的革命开创、长征路上的理想与牺牲，到抗美援朝、“两弹一星”、红旗渠、北大荒的艰苦创业；从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的历史瞬间，到抗洪、抗击非典、抗震救灾、载人航天等重大实践，再到脱贫攻坚、抗疫、探月工程、北斗建设、医疗援外、深海探索等新时代篇章，一条由信仰、奋斗、创造和奉献汇成的精神长河，随历史进程不断展开。

《大河奔流》并未将“精神谱系”处理为静态的知识图谱。书中所写的精神坐标，既有以人物命名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

也有以地名命名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还有以重大事件和伟大实践命名的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标签”，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呼应、接续生成的精神力量。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源头贯穿全书，不同年代的奋斗实践，则使这一精神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获得具体形态和时代内涵。

作品善于从历史大叙事中寻找小切口。北大红楼并非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处重要旧址，在李劫笔端，它连接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思想探索，也连接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北京党组织早期活动的历史脉络。读者由一座红砖红瓦的建筑进入历史深处，看到思想如何在青年群体中激荡，理想如何从文字、讲演、讨论和行动中逐步生长。

这种叙事方法，也体现在革命岁月的书写中。《红色熔炉：井冈山》《永远的长征》《遵道义大转折》《延安精神：岁月流金，信仰永驻》等篇章，并未简单重复人们已经熟悉的历史结论，而是将视线投向具体处境中的选择：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危急关头，何以坚持；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岁月里，何以创造；在革命道路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何以把握方向。井冈山、遵义、延安不再只是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名，长征也不再只是艰苦卓绝的历史行程，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成长的重要现场。

书中对人物的书写尤为值得重视。它既书写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也关注基层群众、普通战士、建设者、劳动者和无名英雄。从沂蒙山的三个女人、申纪兰，到奔赴祖国最需要之地的人们，以及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和边疆建设者，作品始终没有将“伟大”理解为少数英雄人物专有的品质。精神长河，正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坚守与创造汇成。

这也使全书具有文学感染力。文学并不只是修辞意义上的华美，更是对人的处境、情感和命运的理解与呈现。《大河奔流》中的不少篇章兼具报告文学、纪实散文和历史随笔的综合色彩。作者往往从一处场景、一个人物、一段往事写起，让读者在具体细节中感知精神的力量。革命者在困境



中的坚守，建设者在荒原上的创业，科研人员在长期攻关中的沉潜，基层干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奔走，医护人员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逆行，都并未被置于口号化的叙事框架中，而是通过行动、情感、牺牲与担当，呈现出精神的真实质地。

这种“见人见事”的写法，使全书避免了概念先行的局限。精神并不是外加于人物的评语，而是在人物行动中自然显现的价值取向。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并不只是因为“雷锋”这一家喻户晓的名字，更因为助人、敬业、奉献、向上的人格力量，在不同年代始终具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焦裕禄精神之所以令人感怀，也不只是因为兰考治理“三害”的历史业绩，更因为一个共产党人面对群众疾苦时所表现出的责任感与赤子之心；脱贫攻坚精神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正因为它由无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改变山乡面貌的具体实践共同铸就。

从文学表达看，《大河奔流》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即在崇高叙事中保留了历史的丰富性。书中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既有革命年代的壮烈，也有建设时期的坚韧；既有改革开放中的勇于突破，也有新时代实践中的开放视野与科学精神。不同精神坐标之间，既有共同的价值内核，又有各自鲜明的生成背景和表现方式。“两弹一星”精神突出自力更生，载人航天精神强调科学求实，探月精神体现追逐梦想，新时代北斗精神凸显接续奋斗；热爱祖国、勇于登攀、协同协作、无私奉献，又构成它们彼此贯通的精神内核。全书由此呈现的，不是若干彼此平行的精神名称，而是一种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精神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河奔流》具有鲜

明的当代价值。今天读者阅读党史和红色经典，所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补充，更是一次理解历史、理解中国、理解自身处境的过程。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人们仍会追问：何以坚持理想？何以在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之间作出选择？书中那些跨越时空的故事，提供的并非简单答案，却能让人重新理解责任、信念、奋斗、奉献、团结等词语的现实含义。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部书没有把“精神”写成遥不可及的高处风景，而是将其还原为一种实践伦理：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下；既属于英雄人物，也属于每一位忠于职责、服务他人的普通人。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大河”之所以能够奔流，不仅因为源头深远，也因为沿途不断有新的支流汇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亦是如此：它源于伟大建党精神，又在一代代人的奋斗中不断充实、延展与更新。

本书以开阔的历史视野、扎实的故事叙述和饱满的人物书写，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次文学化呈现。它让读者看到，精神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推动历史前行的重要力量；故事也不是精神的装饰，而是精神得以被理解、被记忆、被传承的重要方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读《大河奔流》，其意义不仅在于回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坐标所连缀的历史长河，更在于从一个真实的人物、事件与选择中，理解信仰、人民与奋斗何以成为贯穿百余年历程的深沉力量。精神长河奔流不息，正因为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时代里，为它注入新的水流。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贵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导）



摘自《亲历循环经济变革》，诸大建著，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4月出版。

展望下一个10年

站在今天，展望未来10年中国和世界的循环经济发展，我觉得需要有跳一跳上台阶的新思考。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原生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量与经济社会发展脱钩，但是要区分物质流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控制

增量阶段，引入循环经济是在物质流的全过程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循环，控制物质消耗和废弃物的过度增长，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脱钩；在用好存量阶段，引入循环经济是在物质流的输入输出有总量控制的情况下，用好物质存量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绝对脱钩。中国发展目前正在阶段转化之中。今年以来我多次作报告，对中国循环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就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老问题发表了新看法，概括起来强调十二个字，即用好存量、三重循环、源头设计。

一是用好存量——在为什么的问题上要从增量思维到存量思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可以分为两个40年，1980年到2020年的第一个40年是高速增长，主要解决物质积累“从无到有”的问题，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源消耗与废弃物产生同步增长。过去20年中国搞循环经济，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对传统的线性经济打补丁，属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2020年到2060年的第二个40年是高质量发展，主要解决物质需求“从有到好”的问题，通过结构变化控制和减少资源消耗及废弃物的规模。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2万至3万美元，物质存量优化替代物质增量扩张将成为主要矛盾。循环经济的本质是资产管理，是对已有的物质资产进行创造性的优化再利用，因此中国发展的第二个40年是循环经济的主战场，可以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类似双碳发展是要实现碳排放的趋零增长，循环经济的雄心是要逐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废弃物产生能够从正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

二是三重循环——在是什么的问题上要从材料循环到三重循环。研究循环经济，我一直强调循环经济的循环是有完整性的三重循环(Three Cycles)，而不是只有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材料循环。在由材料循环、产品循环、服务循环组成的三重循环中，物质流闭环循环的路径越短，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就越好，即服务循环优于产品循环，产品循环优于材料循环。三重循环的概念对于中国第二个40年的用好存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方位地推进三重循环可以创造性地开发利用我们已有的和将有的物质资产存量。具有源头意义的是，给设计界的朋友讲三个循环的概念，他们说这可以有操作性地推进他们的可持续性设计或者循环经济设计实践。

(1)城市矿山与材料循环。材料循环，是要充分利用各种废弃物组成的城市矿山，从几百亿吨计量的城市矿山中开发再生资源替代原生资源，以及发展具有升级循环意义的静脉产业(再生资源产业)等。2019—2020年包括工业、农业、建筑、生活垃圾在内的中国固废产生量为110亿吨(2020年中国GDP为100万亿元人民币，二氧化碳排放为100亿吨)，按照比重大小分别是工业、农业、建筑、生活垃圾。目前，中国固体废弃物的年回收利用率大约60%—80%，即60亿—90亿吨，累计存量为600亿—800亿吨。已有研究指出，2029—2030年中国固废将达到峰值120亿吨，然后平稳发展到2050年。如果未来中国的GDP增长率逐渐从高速下降到中速，同时废弃物回收利用率随时间逐渐增大，就可以实现废弃物产生量和存量的绝对减少。循环经济发挥材料循环的作用，意味着城市中的废塑料就是城市油田，废纸就是城市森林，废钢铁就是城市铁矿。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的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虽然高，但是因为产生量大，建筑垃圾的存量依然在增长。未来的城市更新以循环经济的存量管理为导向，一旦原生材料有50%以上被来自城市矿山的再生材料所替代，就可以为循环经济在材料使用上成了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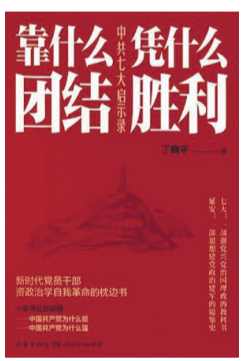
(2)物品存量与产品循环。产品循环，是要延长物品存量的使用时间，主要是针对家电、家具、汽车、住房等各类耐用产品，降低它们变为废弃物的速度。以建筑物为例，现在中国2000年以前的旧房子占了28%，上海甚至超过了50%。与过去40年大规模的城市增长和新房建设不同，今后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城市更新和旧房改造。从城市更新发挥循环经济作用的角度看，建筑物推倒重来、拆除重建应该控制在小部分，大部分建筑物需要循环再利用，要通过对旧建筑的状态更新和功能更新提高附加值，创造更加好的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如果旧房子的寿命是20年，延长10年就可以提高50%的资源生产率和生态福利绩效。未来的城市更新如果能够普遍这样做，可以说循环经济在城市的建筑循环中成了主导。

(3)闲置资产与服务循环。服务循环，是要盘活闲置不用的存量物质资产，除了发展众所周知的共享单车和网约车之外，要发展各种共享建筑、共享绿地、共享停车场等，减少不必要的新建项目。有研究数据指出，中国的房产存量中有20%闲置，2.5亿辆小汽车平均每辆汽车的使用率一天只有几个小时，因此通过租赁、共享等循环经济的服务循环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新建住房与私人汽车的扩张。例如，可以通过收购闲置住房作为保障性公寓，满足城市增量人口的居住需求，由此减少不断地新建房子而无止境地扩张建设用地和消耗建筑材料。又如，私人小汽车可以通过共享平台进行周转，加上发展城市地铁和城际高铁，从而使得城市的私人汽车保有量不至于过分膨胀。

三是源头设计——在怎么做的问题上要从末端思维转移到源头设计。过去20年中国循环经济在回收利用上花了很大工夫，但是废弃物产生量仍然持续增长，问题在于没有从源头设计上防止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循环经济的成功在于源头设计，即一开始就想到使用已有的材料而不是原生的矿产资源，一开始就想到如何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一开始就想好一旦产品报废可不可以向上回收利用而不是向下进入市政垃圾。就微观企业而言，源头设计要有利于三个环节提高物质的循环率，一是在进口的材料选择环节要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 and 再生资源；二是在中间的产品制造环节要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和使用时间；三是在消费后的产品报废环节要提高回收利用率。三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就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乃至社会的物质循环率。特别是过去20年的中国能源革命，已经推动风光组件、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中国出口新三样，在世界上有了强大的新能源发展竞争力。未来推进循环经济的目标，是要使这些新能源产品有好的材料循环、产品循环、服务循环，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循环经济竞争力。

拂拭历史之镜与回应时代之问

刘金祥



《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丁晓平著，作家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某些特殊时刻具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便是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在当代中国史和党史研究的视域中，中共七大作为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节点，始终散发着独特而璀璨的理论光芒。著名军旅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丁晓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以下简称《中共七大启示录》），以敏锐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精辟卓异的理论阐释力和沉稳扎实的学术表达力，重新发掘了这一著名政治事件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七大不仅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更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精准回答了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的永恒命题：一个政治组织何以凝聚力量，又何以引领事业走向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既是对那段峥嵘历史的还原与解读，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哲学与胜利逻辑的深度挖掘和理性思考，为读者特别是党员干部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中共七大启示录》的首要理论贡献在于将七大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书写，同时又超越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概括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我党政治发展规律。1945年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共七大在这一历史时刻胜利召开，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作者丁

晓平通过厚重翔实的历史资料和严谨周致的细密考证，再现了党的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环境，使读者能够深刻把握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挑战和现实抉择。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叙述的单一和表层，而是深入梳理和系统挖掘了七大背后的理论创新价值，即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创新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简单的理论复制和移植，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论创新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着的新情况，始终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和指导上的科学性。作者丁晓平通过系统阅读和科学分析七大文件及相关史料，清晰明确地展示了这一理论创新过程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

中共七大首先解答了“靠什么团结”这一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团结是要有原则的，不是无原则的凑合。”这一论断揭示了政治团结的本质特征——真正的团结不是利益的临时结合，也不是权力的简单依附，而是基于共同理想信念与科学理论指导的有原则的团结，可以说七大的团结观是辩证的、包容的、发展的。《中共七大启示录》对七大所体现的团结哲学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剖析，明确指出七大的团结不是党内简单的一致，而是建立在以共同理想信念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和以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为基础的有机统一。这种团结观既反对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否定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而是通过民主讨论和集中决策的过程，实现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辩证结合。作者丁晓平特别强调了七大所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指出这一原则既保障了党内民主的充分发挥，使不同意见能够得到表达和讨论，又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避免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扩大与影响。通过对七大选举过程和决策机制的细致分析，作者展示了民主集中制如何在实际运作中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为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凭什么胜利”这一根本问题的探讨

上，《中共七大启示录》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力。关于“凭什么胜利”，党的七大给出了清晰而有力的回答——胜利源于人民的支持，源于正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源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七大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将党的胜利逻辑牢牢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之上。《中共七大启示录》的作者丁晓平，在深透分析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战略和组织决策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建立在三个基本支点上：一是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党能够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方向；二是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三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没有将七大决策加以拔高和神化，而是客观分析了当时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和不同意见，展示了真理越辩越明的主要过程。这种历史叙述方式既尊重了历史的复杂性，又突出了集体智慧和民主决策的真实性。正是通过这种由表及里的分析与阐述，读者才能够理解七大的决策不是个人的独断，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通过充分讨论和民主程序形成的科学决策。

《中共七大启示录》的突出特点在于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精彩对话。作者丁晓平不仅呈现和还原了历史真相，更注重挖掘历史对当代的镜鉴与启示意义，通过深入分析和深透阐发七大的团结哲学和胜利逻辑，为当下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历史视角和理论依据。七大在理论创新方面，全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智慧，对于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七大在团结统一方面，倡导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至今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础。七大在胜利逻辑方面，坚决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

《中共七大启示录》最后指出，七大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政党建设的新范式，一种政治发展的新逻辑。这种新范式和新逻辑不仅适用于革命时期，也适用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具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普遍价值。从学术角度看，《中共七大启示录》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维度和方法。作者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法，将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融会贯通，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在史料采集运用上，作者既重视官方文献和档案资料，也关注个人回忆录和口述历史记载，通过多种史料的相互印证，构建了立体化、真实化的鲜活历史图景。该书的理论建构也值得赞许和称道。作者丁晓平并没有满足或止步于对史实的铺陈与叙述，而是致力于逻辑梳理、理论概括和规律总结，并据此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断和观点，例如关于“团结哲学”和“胜利逻辑”的阐述与疏解，不仅准确把握了七大精神的核心要义，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文化和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共七大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但它的精神光芒依然照耀着我们党前进的道路。本书通过对七大这一历史事件的全方位撰写、解读和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哲学和胜利逻辑，也为我们在新时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总之，丁晓平的这本书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学术广度、理论深度、情感温度和阅读广度的优秀纪实文学作品。它通过对中共七大的深度阐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和发展逻辑的来龙去脉，也为我们在新时期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启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部作品正是这样一本引人深思的历史教科书，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当下政治发展的国人阅读学习和认真思考。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